



断裂与转型

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

Between Empires:
Rup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王晴佳 主编
李隆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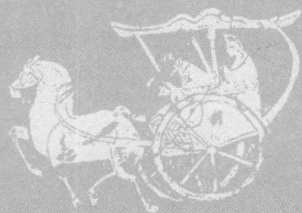


断裂与转型

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

Between Empires:
Rup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王晴佳 主编
李隆国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 / 王晴佳，
李隆国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325-8283-9

I. ①断…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亚洲—历史—
研究②欧洲—历史—研究 IV. ①K307②K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8012 号

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

王晴佳 李隆国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466,000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8283-9

K · 2267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谨向北京大学人文基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北京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的资助表示衷心感谢！



“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国际会议开幕式现场



“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国际会议研讨现场

编者前言

2015年6月26至28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协办,由北京大学人文基金、历史学系和西方古典学中心提供慷慨资助,在北京大学中关村新园召开了“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Between Empires: Rup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的国际会议。本书以论文集的形式,选择性地将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和作者修改之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出版。

历史研究采取比较的眼光和手段,堪称一个为时悠久的传统。近年世界范围兴起的全球史书写,更让这一传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从全球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虽有五大洲、七大洋,但欧亚大陆的历史在整个世界史的演化中,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位于欧亚之间中东那片“新月”状的地带,不但连接了欧亚两大洲,而且还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由此往外延伸扩展,在古代出现了几个著名的文明中心,如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等。而在亚洲的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出现了早期的印度和中国文明。到了公元前2世纪上下,更有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强盛、安息帝国在西亚的崛起和汉帝国在东亚的确立。不过自公元3世纪开始,这些帝国均先后走向了衰落:汉帝国于220年正式灭亡,安息帝国也于224年为萨珊王朝(224—651)所取代。罗马帝国经受了“三世纪危机”的重创,渐渐走向了分裂,分为东西两部,最后西罗马帝国于476年消失。由此,欧亚历史大致走入了一个“古代帝国之后”的时代,这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题。

本次会议取名为“断裂与转型”,包含有双层的含义。首先,帝国的消亡表现出历史的一种“断裂”。在东亚汉帝国和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亚历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裂变,其后果和影响十分深远。以中国历史而言,史家向来推重大一统的王朝,注重其间兴衰递嬗。但在汉朝之后,中原大地分裂达四个世纪之久,为前代和后世之未见,由此成为王朝兴替模式的一个异类。而且这段分裂时期,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正反

两方面的影响。其负面的影响就是，帝国一统局面不再，造成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中国人口剧降。但从正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期间，不但思想文化上新意纷呈，经济上亦有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并在之后的历史演化中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地中海大一统世界转化为中古欧洲的分裂局面，发生了与中国类似的变化。但巨变、裂变抑或“断裂”之后也促成了“转型”，这是本次会议谈讨的另一层意涵。比如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中国在6世纪末迎来了隋唐的统一局面；中国的古代文明通过与西域各族的交流，成就了唐代的成功“转型”，在许多方面其历史意义堪与汉朝相媲美。而欧洲在8世纪也迎来了加洛林帝国（后来转型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查理曼（800—814）所创建的帝国，囊括了欧洲大部，延续了近百年。9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更是强势复兴，进入鼎盛期。更值得指出的是，帝国之后的历史“转型”，似乎还在不断继续。唐朝于907年灭亡之后有半个世纪的振荡，但北宋在960年的建立则又结束了这一分裂局面，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转型期。在宋朝（960—1279）统治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迁。仅就科技发明而言，中国文明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便诞生于那段时期。10世纪下半叶，由奥托王朝正式奠定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联姻，双方人员来往密切，文化交流频繁。11世纪之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不断向北、向东、向南强势扩张，在政治上大一统帝国与封建制度互相补充，经济上农业大规模拓殖、城市强劲复兴，文化上亦出现12世纪的文艺复兴、各种大型教堂互相比较力、竞相攀高，中世纪欧洲逐渐步入盛期。

以本次会议的英文标题来看，其原义可以译成“帝国之间”（Between Empires）。这一提法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含义。其时间上的含义与上面所谈的“断裂与转型”相连，也即在汉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欧亚在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变迁，由此促成了不同程度的转型。而在空间上，“帝国之间”还想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从东亚到西欧的区域，也即广阔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地区。本论文集收入的理查德·佩恩和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的论文和在会议上北大荣新江的发言（未能收入），都展现了这一努力。荣新江的发言主要有关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与理查德·佩恩有关萨珊王朝如何成为东西文化的沟通者的文章，相得益彰。稍感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召集如此高层次的历史学学术会议，属于这一方面的论文还是相对少了一些。

西方中世纪史和中国汉、唐、宋的历史，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以前者而言，此次会议由西方重量级的专家参会和发表论文，而北大历史学系的专家也提

供了高质量的论文。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合两者的力量,从比较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汉朝以降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历史,从比较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研究。与会者的论文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其荦荦大者为帝国之后政治动荡、政治秩序的重建;文化、族群的融合和交流;汉唐帝国与中亚和西亚政权之间的联系(如丝绸之路);史学写作形式的变更和历史意识的重构及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言,此次会议还突破了中西比较的界限,由一些研究中亚、西亚的专家参与会议,对公元3世纪至公元12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从事相关的探讨。本书的编排,基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帝国之后历史的变迁,第二部分探讨相关时期史学的更新及与历史变化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狄宇宙教授跳出了游牧族群回应定居族群带来的冲击的传统视角,提出了内陆亚洲世界是否存在独特的政治文化的问题。他的讨论充满了深刻的学术洞见,对学术界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篇文章也表明,由于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这一新的研究取向所面临的困难。如若将狄宇宙教授的这篇宏文与瓦尔特·波尔教授的文章对读,则可以了解到,对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帝国与蛮族关系,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会如何地不同。波尔教授精辟地指出罗马帝国与蛮族之间的关系乃是不对等的,而在后罗马帝国时代,诸蛮族政权之间建立了相对平等的国际关系。王小甫教授综合韩国和中国史书,从中韩关系的角度,贯穿各种名物、史实,梳理出韩半岛三国时代之前的政治名号的演变线索。他的文章与波尔教授的观点颇有互相唱和之效。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教授的《古代晚期欧亚大陆的世界大战》一文,则似乎在为狄宇宙教授提供具体的案例。他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事战略策划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草原帝国不仅具有自己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利用周边诸农耕帝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理查德·佩恩同样关注亚欧大陆东西部之间的联络,他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对萨珊王朝的巩固贡献巨大。利用洲际贸易,萨珊宫廷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而且还通过赏赐宫廷制造的昂贵礼品,赢得贵族的支持,在不触动贵族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彼得·席泽尔教授的视野也同样宏观,但是他将考察的地理范围局限于欧洲。在这篇讨论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欧洲历史发展的宏文中,席泽尔教授按照农耕发达程度将欧洲自南向北、从西到东分成三大区域。他强调,三大区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形塑了欧洲此后的基本政治地貌。同样是考察跨地区之间的联系,斯蒂芬·艾斯德尔斯教授的关注重心是地中海世界。他以中古早期3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为例,揭示地中海世界的相互联系,并从理论上反思了强调东西发展异途的传统“分离”思路的局限

性。范维里克向我们介绍了在罗马帝国肇建时期，罗马与蛮族盟友之间的关系。为了削弱帕提亚帝国的盟友圈，罗马统帅如何维持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稳定。他选择的个案是马克·安东尼于公元前36年发动的帕提亚远征。

王晴佳教授的文章，则把关注投向了历史书写方面。他注意到并从多个方面论证，在这一时期亚欧大陆东西部几乎同时发生的帝国崩溃和蛮族王国建立导致了新的“国史”编纂趋向。通过初步的比较，他指出这一新变化对东西方传统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赫尔穆特·海米茨的文章梳理了中古早期西部欧洲历史书写中的认同性变化。他指出，当拜占庭帝国还在恪守帝国认同的时候，西部欧洲则在缓慢而日渐清晰地形成多民族认同。戚道安教授以南北朝史书中的“蔑称”入手，探讨了这一时期历史认识中出现的“族群化”倾向，并强调它对东亚历史认同进程具有长时段影响力。江湄教授的文章在回应这一观点的同时，强调了宋元之间的华夷之辩也在与时俱进。阅读这四篇文章可收到互相印证之效。

颜·伍德教授讨论了对于西部罗马帝国灭亡的认识。他深入地揭示了中古早期西部欧洲各地史学认识的多元化趋势。他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西部罗马帝国灭亡并非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单线进化式的。李开元教授的文章提醒我们战国时代如何在秦汉之际重演。赵冬梅的文章则系统分析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对于历史写作带来的压力，她以司马光为例，揭示了史家与社会观念之间的细腻互动。

邓小南教授的文章则开启了讨论帝国治理的一组文章。通过综合利用各种史料，探幽钩玄，邓小南尽可能复原了宋代宫廷文书运作诸环节。叶炜重新总结了唐代皇权的运作机制，指出了皇权分权与决策干预相结合的特色。李云飞教授关于加洛林王朝的分国计划的研究，提供了探究中国古代皇权的一块有力的“他山之石”。刘寅对加洛林王朝政治话语的分析则昭示了，借鉴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话语，会对欧洲中古早期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多么积极的意义。李隆国的文章也在表明，加洛林政治与中国古代政治极具可比性。

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夏洞奇展现了，对身边历史小人物的描写如何反映作者（这里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世界，蔺志强则提醒我们，如何结合中古话语自身的语境来解读历史文献（这里是《大宪章》）。

在筹备此次会议期间，我们得到了马克垚、彭小瑜、王新生、高毅、荣新江、罗新、张帆、王元周、咎涛等教授的不少建议和帮助，而在翻译、整理和出版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的

过程中,北大历史系和北大社科处的领导又再度提供了财政援助,使得本论文集能顺利出版,在此我们呈上深切的谢意。我们还要感谢荣新江、辛德勇、陆扬、余欣、魏斌、朱孝远、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黄春高、周施廷等人的参会。此次会议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开会和出版论文,翻译就成了一种必需。我们感谢陆扬、刘寅等在会议期间协助口译和袁剑、刘玺鸿、刘寅、康凯、潘墩等人的笔译,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此次会议无法顺利进行,论文集的出版也无从谈起。美国圣母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刘寅,北大历史系学生黄明浩、赵象察、王班班、孙沐乔等人在开会期间,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收入的照片,均为黄明浩所摄。最后,我们要感谢提供并修订了论文的各位作者,并期待读者方家的不吝指正。

2017年2月8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关于草原帝国历史分析的理论思考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1
后战国时代论	
——秦帝国崩溃后的断裂与转型	李开元 26
蛮族和罗马帝国	
——一个可资比较的框架	瓦尔特·波尔 (Walter Pohl) 38
寻盟：公元前 36 年马克·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目的	
.....	范韦理克 (Hendrikus van Wijlick) 49
从半岛三韩到三国时代	
——古代韩半岛的国家认同历程	王小甫 56
古代晚期欧亚大陆的世界大战	
.....	詹姆斯·霍华德 - 约翰斯顿 (James Howard-Johnston) 68
丝绸之路与古代晚期伊朗的政治经济	理查德·配恩 (Richard Payne) 81
西罗马帝国何时终结?	颜·伍德 (Ian N. Wood) 99
476 年之后西部诸王国和东罗马帝国	
——6 世纪和 7 世纪中有关地中海地区内聚力与联系的三个注脚	
.....	斯蒂芬·艾斯德尔斯 (Steffen Esders) 111
诸子均分与帝国一体：817 年度诚者路易的传国计划	李云飞 125
淮水边境与中古早期族群化进程	戚安道 (Andrew Chittick) 152
唐代集议述论	叶 焯 166
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邓小南 191

第一个千禧年中欧洲的帝国与发展·····	彼得·席泽尔 (Peter Heather)	229
欧亚“国史”之比较研究：帝国之后史学变迁一例·····	王晴佳	247
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 ·····	赫尔穆特·海米茨 (Helmut Reimitz)	276
罗马尼亚努斯与奥古斯丁：《忏悔录》6.14.24 释微·····	夏洞奇	291
名实之间：学术棱镜中的查理曼称帝·····	李隆国	307
“训诫”与加洛林政治的“说法”·····	刘寅	322
从辽、金行记看宋代士人的“华夷之辨” ——也论宋朝的“中国”意识·····	江湄	348
试论北宋中后期的碑志书写 ——以司马光晚年改辙拒作碑志为中心·····	赵冬梅	373
Libertas 的误译与《大宪章》的误读 ——管窥中古英国的自由与特权·····	蔺志强	398

关于草原帝国历史分析的理论思考^{*}

狄宇宙 [Nicola Di Cosmo,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 译

本文旨在对古代历史形成的一种特殊类型——所谓的游牧帝国 (steppe empire) 或草原帝国 (nomad empire) 的解释模式加以回应。在过去的 15 至 20 年里,在中国研究领域,对于中国历史中“边疆”(frontiers)的角色以及“边疆研究”(frontier studies)的兴趣日增^①。这种反应的起点可以被囊括在下面的状态中:直到近代,由于强大游牧帝国的存在或者拜其扩张的结果所赐,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所环绕着的文明看成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有意义的单位。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挑衅的立场,而世界的历史学家可能都不会认为这一具有“连续性”的东西会出现在欧亚大陆不同区域之间,并足以使用一种欧亚尺度的分析标准来证明长距离网络的存在。

在另一方面,关于游牧帝国形成的主题形成或者深化了更为深入和广泛的联系,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②,或者至少难以挑战——因此,问题在于,其中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历史角色。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会立即遇到草原帝国反复无常的本性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动物,它们极难加以定义,而在 16 世纪自然科学书的插图画家那里,也常常缺乏原生态的信息,他不得不像描绘一头长颈鹿或一只鸭嘴兽那样,不曾亲眼所见,而仅仅从旅行家或传教士的叙述中加以想象。尽管如此,那里还有关于方法的问题

* 这篇文章的细微修订版可见“China-Steppe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收录于 *Complexity and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s. Jan Bemmman, Michael Schmauder (Bonn 2015): 49—72。

① S. Harrell,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N. Di Cosmo, D.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Routledge 2005) P.K. Crossley, H. F. Siu, D.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2009). Y.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② 例如 Th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 pp. 210—211.

需要得到解决,以获取更为精确的叙述。这种努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描述游牧力量与定居力量的政治关系,它们对于治理的态度,并进而通过揭示其自身进化所独有的转变过程而将它们“历史化”。

对于这些帝国如何产生以及这些帝国的扩张对那些区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存在很多争论,至今仍然难以找到一种单独的解释。关键在于,它是否可能通过为这些形成过程赋予一种历史角色,进而认识到差异性与不连续性,而与此同时,获得可能的等价性和相似性。集中在将游牧帝国归为不同类型的绝大部分研究路径屈从于一种内在的偏见,也就是说,只关注那些完全避开真实的历史意外事件和压力的结构,而恰恰是在这些意外事件和压力之下,特定的政权才得以形成。如果我们为这些帝国赋予历史意义,那么,“冲突”本身、草原帝国的形成,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无法被忽视:从帝国的出现到其后来的扩张,再到后面的转型。

三个经典问题

在我们试图对中国长城周边地带的早期游牧帝国的历史角色加以分析探究时,我首先准备对学术研究中通常会碰到的三个假设重新进行分析。在这三个假设中,第一个假设认为草原与农耕之间存在一种严格的分化,即在两个有界实体——游牧民与农耕民,或者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一种两分状态(dichotomy)。第二个假设按照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分裂周期将游牧人的历史加以观念化。第三个假设由我们可能称之为类比思维的东西构成,在这种思维下,常常会基于对不同时期“游牧民”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同义性)的假设而加以类比。

两分法

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地理学研究路径中,中原的北部边疆被认为是一块生态、经济和文化体系方面的转变区域,这一区域沿着由蒙古高原构成的关键分水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更大的差异,这就使得黄河流域产生了灌溉农业,而在其北部的荒漠和草原这些更为干旱的区域则发展出一种游牧经济^①。这就形成了长城边疆区域,在这一区域两侧所出现的社会与政体注定被锁定在一

^① O.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1962), pp. 176—177.

种开放与封闭、前进与后退、共生与分离、掠夺与商贸、战争与和平的拉锯战当中。这种深刻且不可调和的二分世界图景已经成为关于游牧政体发展的诸理论以及关于特殊事件(战争、入侵、征服等)的基本框架的主要表现形式,即便在时代或是周期性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在这种二元式的结构中,一直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所有的现象都能够围绕边疆来加以观察:草原与农区的对抗,军事价值与文化及道德价值的对抗,部落与国家的对抗,汗王与皇帝的对抗,游牧与农耕的对抗,军事参谋与行政机构的对抗,掠夺、朝贡与税收的对抗,等等。基本的假设认为,在如此不同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下生活着的人们,在千百年之后,发展出了不同的技术、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系,这些互动形成了在边疆发挥作用的机制。

基于这种认识,边疆作为一个接触区域,其首要特征在于其将在对两个相区隔的生态(一种是温暖潮湿的,另一种是寒冷干燥的)的长期适应后形成的两种相区别和不相容的经济体系加以区分和联合。在中原,文明是以基于由密集农业维系的稳定、定居农耕社会之上的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官僚制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草原,动物的饲养仰赖对土地的大量使用,以及被组织进拥有特定领地的血缘集团和政治联盟的稀疏的、低密度的人口。从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原(或者华夏民众)就建立起了国家机构,并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逐步发展出跨越自身文化空间的众多共同体(邦国与王国)的一种共同政治文化和一套价值体系。游牧民则发展出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更容易在一个军事贵族阶层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以达到威胁中原的目标。然而,这种关系并非总是充满敌意的,而是包括了因外交、政治或其他需要而出现的边境贸易和物物交换等诸种类型。

认为这两种相分离的体系在政治、文化和生态的边疆地域发生接触的理念就是关于依存、互相依赖和共同演进的诸种理论的关键,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加以阐释,边疆作为游牧帝国生成和维系之地的理论也是如此。这些理论所关注的是在定居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的一种经济性差异的存在,尤其会假定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其永久性的短缺局面驱使着游牧力量从周邻的定居国家那里寻找他们缺乏的物品^①。除此之外,类似的观念则假设一种政治差异的存在是对采纳更为先进的组织形式的补偿。维系那些游牧帝国的组织机构,不管是比部落更大的国家(或酋邦),还是最终的汗国

^①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44 (Cambridge 1984), pp. 69—84.

和帝国,都是从更为复杂的定居国家那里借用来的。这两种假设对于在早期游牧力量中的国家形成模式的构建十分关键,在这当中,游牧的缺陷与需求被转化为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对定居民众产生了持续性的压力,使游牧力量与庞大的定居国家形成竞争,并激励着他们从这些定居国家引进并采用相关的组织机制^①。

与这些假设恰恰相反,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敌对和相互排斥的体系之间的明晰分界表现得要少很多,尤其要考虑到关于草原移民和有限农耕的那些无可争辩的证据,诸如河谷地带和拉铁摩尔所称的“草原绿洲”地区^②。此外,对历史证据的详细探究表明,游牧侵占了定居的土地,其中包括强夺与劫掠,这些都发生在与经济需求无关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历史文献记载当中,游牧国家形成的机制都是游牧力量内部战争的结果,因此,它跟定居国家产生的冲突,与通常的假设相比,其关联性似乎要小得多。

总而言之,草原与农地之间加以二分的中心性(centrality),可以被理解为是自古以来中原与游牧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它一直在扮演着一种理论性的障碍,它阻碍了人们对相关物质证据的公正评价、对历史资料的阐释以及通过与古代游牧社会历史相关的考古学、气象学和其他科学而获取其他额外数据。更进一步来说,对游牧一定居加以两极化的内在偏见试图避免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并代之以抽象模式的构建,轻易就认定存在两个对立的空间,而丝毫没有对此表示质疑。

周期性

在关于游牧帝国形成的观念方面所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周期性问题。传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用王朝自然兴衰的周期术语来指称无序与有序(战争与和平)。政府无法确立对蛮族的稳固防御屏障则是王朝灭亡的潜在因素之一。无法运用正确的边疆战略会导致灾难,而且从汉朝开始,边疆防御和“蛮族”管理就成为政策争论的主轴,而决策者和儒家则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认为政府应该因时制宜。

学者将这些周期看成是游牧帝国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游牧力量的兴起与消亡,换句话说,他们联合成为强大的帝国(或称“汗国”)以及瓦解为更小、更分散的集团(部落? 国家?),这些都是游牧历史的自然节律。拉铁摩尔关于游牧历史的理论几乎

① T.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Oxford 1989). idem, “The Shadow Empires: Imperial State Formation Along the Chinese-Nomad Frontier”. In: S. E. Alcock and others, (eds.), *Empires* (Cambridge 2001), pp.10—41.

② O.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1962 [New York 1940]), pp.157—159.

完全没有受到过挑战。这种观念认为周期对于游牧社会而言是固有的,而诸多部落能够在—位特别成功的军事首领的集权领导下周期性的统一起来,这跟卡里斯玛领导权的意识相关。“汗王”必须应对游牧力量的广泛需求,他会利用军事力量对抗定居敌人,并创建“超部落”的联盟。如果游牧力量对资源的攫取被看作是长城边疆沿线关系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游牧周期就成为中原历史发展周期的一种反映,而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也同生共灭。我们将会在下—部分对这一问题加以展开,但是我会简要指出的是,将作为两种机制性连锁力量的草原与定居力量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解释为是一个单一机制中嵌合的齿轮,这种理论性建构尚有待物质材料证实,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历史或考古证据的支撑。由于这一思路的巨大影响力,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从拉铁摩尔到梁赞诺夫、巴菲尔德和克拉丁(Kradin)^①,但是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所积累起来的证据使这一理论路径变得不再可行。

从一个更为狭义的历史学(而不是考古学或人类学)观念来看,关于集中和分裂周期的旧观念标示出了草原历史的自然节律,并认为这些周期可能已经被与定居帝国的二元关系所诱导,而这又在客观上扭曲了对于各个游牧帝国而言特殊的意外事件的探究。假如一个游牧帝国的形成过程被理解成一个“复发性”事件,而每个事件之间的起因被视作是可互换的,偶然方面最终可以忽略不计,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周期本身的表征,通常体现在位置、强度以及持续性等方面。此外,在周期性理论中,游牧周期反映了定居帝国的周期性,并有必要预定对游牧政权与定居政权之间的互动加以更多的关注,进而对边疆关系与互动加以关注,而不是对游牧世界的内在机制或者游牧政权与其他既非定居也非“帝国”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

类比

第三个更微妙的,从而更具弹性的问题则是历史类比的推论所造成的。经由将希罗德对斯基泰人的描述(或其他西方叙述)跟司马迁对匈奴的描述承接起来,对应与类比就被标识了出来。这些“蛮夷”的形象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欣然

^① O. Lattimore,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91. 1, 1938, pp.1—16. A.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44 (Cambridge 1984)., Barfield, 1989, N. Kradin, “Nomadism, evolution, and world-systems: Pastoral societies in theori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8 (2002), pp. 368—388. Idem, “Early state the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pastoral nomads”.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7 (2008), pp.107—130.